

史记研究史略

张新科 俞樟华 著



三秦出版社

序 言

韩兆琦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而且又是一部集先秦两汉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汉代以来，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历法、民族、医学等任何一个门类的问题，都无不先从《史记》入手，仅此一端，就足以见《史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深远了。司马迁与《史记》在世界文化之林的大山一样的位置是有目共睹的。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史记》的研究却远远不够。近十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开拓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出版的著作也较多。在文、史以外的其他学科也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情况是令人欣慰的。但与其他热点比起来，则《史记》的门庭仍是冷落的，它不仅无法与孔子、曹雪芹、李白、杜甫相比，而且还不如吴敬梓、蒲松龄，时至今日，连个全国性的、省市性的研究会都没有，这就和司马迁与《史记》的地位大不相称了。是不是因为司马迁太伟大，使人们反而不敢轻易染指？我想也不见得。是不是因为《史记》横跨文史两个领域，从而使两个领域的学者们彼此观望等待？我也说不清楚。但有一条是明确的，那就是国内外研究《史记》的学者们应该加强联络，应该及时地互通消息，彼此促进。为此，不揣冒昧，我在1987年5月邀请了以中年为主的20多位国内《史记》专家，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讨论会，并成立了一个《史记》研讨会的联络组。接着1988年5月，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光勇教授和韩城市民盟的张天恩同志又在西安和韩城举办了第二次《史记》讨论会，

并出版了论文集。按计划，1989年10月准备在徐州由吴汝煜教授举办第三次讨论会，但不幸由于吴汝煜教授当时患病，后又不幸去世，此会竟未开成。为了不负同仁们的期望，为了悼念近几年来为促成《史记》讨论会的召开付出过努力而又过早去世的程金造先生、邵双成先生、吴汝煜先生，我决心于1991年4月再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史记》讨论会，届时还将邀请香港、台湾、日本的《史记》研究者们前来参加。

张新科和俞樟华两位同志是近几年来对《史记》致力较勤，用功颇深，而又取得成果较多的青年同志，他们在研究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的同时，又对历代研究《史记》的状况进行了系统周详的整理，写成了《史记研究史略》一书。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史记学”的一项学术空白。作者将两千多年来复杂的《史记》研究系统化、条理化，对前贤今哲的精辟分析既有引述，又有评论；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两千多年的研究史料既多且杂，且又极其分散，而作者却能爬罗剔抉，披沙拣金，突出重点，把握住不同时代的不同研究状况，从而展示出它们各自的新特点，新进展。这样，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历代研究《史记》的全貌，而且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信息，让我们知道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出现过哪些研究《史记》的著作，这些著作大都提出了些什么问题，学术价值如何，于是这就又具有了一种目录学的价值。尤其应该提出的是，作者对台湾、对国外（主要是日本）的《史记》研究状况也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与评价，这些更为以往的目录书所没有，对于《史记》爱好者、研究者的彼此沟通，互相联系，对于进一步开展有关《史记》的研究，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作者对于如何开创《史记》研究的新局面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设想，这对于“史记学”的建立也有重要意义。作者说，他们写这本《史记研究史略》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但我认为这种尝试是很值得称道的。在

这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我写了以上的话，向本书的作者祝贺，
向海内外的《史记》同好们致以亲切的问候，祝大家在《史记》
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新成就。

1990年5月27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史记》在汉魏六朝时的传播和初步研究	(10)
一、传播《史记》	(11)
(一) 节引《史记》	(13)
(二) 引用《史记》注释古籍	(15)
(三) 择抄、删定《史记》	(16)
(四) 记载、宣传司马迁事迹	(16)
(五) 史学的繁荣促使《史记》向更广的领域 流布、渗透	(17)
二、补、续、辨、注《史记》	(18)
(一) 褚少孙补《史记》	(18)
(二) 诸家续《史记》	(21)
(三) 渔周、颜之推辨《史记》	(22)
(四) 诸家注《史记》	(23)
三、总评《史记》	(24)
(一) 《史记》的体例	(24)
(二) 《史记》的内容	(27)
(三) 司马迁的史才	(31)
(四) 初步从文学角度评价《史记》	(32)
第二章 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 地位	(34)
一、《史记》三家注	(37)
二、论《史记》的编纂体例	(42)
(一) 以纪传体为修史正宗	(43)
(二) 关于《史记》的五体	(47)
(三) 《史记》的标题	(55)
三、韩、柳对《史记》研究的贡献	(60)
(一) 韩愈论《史记》雄健	(63)

(二) 柳宗元论《史记》峻洁·····	(65)
第三章 宋代开《史记》评论的风气·····	(68)
一、始开评论《史记》的风气·····	(72)
(一) 苏洵对《史记》互见法的发现·····	(73)
(二) 苏辙、马存论壮游与风格·····	(74)
(三) 《史记》人物论·····	(76)
(四) 宋人评论失误的原因·····	(79)
二、马班异同成一门学问·····	(84)
(一) 马班异同说的产生·····	(84)
(二) 如何区别马班异同·····	(85)
(三) 《班马异同》专著问世·····	(86)
(四) 马班的不同风格·····	(89)
(五) 清人论异同·····	(91)
(六) 今人论异同·····	(93)
三、元代对《史记》研究的贡献·····	(94)
(一) 元人论《史记》·····	(95)
(二) 用戏曲形式宣传《史记》·····	(97)
第四章 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	(99)
一、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	(102)
(一) 《史记》文章的审美价值·····	(102)
(二) 《史记》人物形象的刻画·····	(109)
(三) 《史记》的艺术风格·····	(116)
二、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认识·····	(120)
(一) 明人认识的逐步提高·····	(120)
(二) 金圣叹的杰出贡献·····	(124)
(三) 清人的认识·····	(126)
(四) 今人的探索·····	(128)
三、其他成就略论·····	(129)
(一) 明人的考辨·····	(129)
(二) 明人的辑评·····	(133)
第五章 清代《史记》研究在深入发展·····	(136)

一、乾嘉学派考证《史记》的硕果	(140)
(一) 考订文字	(141)
(二) 考订地名、人名	(144)
(三) 考订年月	(146)
(四) 考订作者生平	(147)
(五) 考订书名、断限、缺补	(150)
(六) 考订史实	(151)
二、《史记》评论方面的主要成就	(153)
(一) 对《史记》的总体评价	(153)
(二) 论《史记》中的“表”	(155)
(三) 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160)
三、桐城派等对《史记》艺术美的研究	(164)
(一) 方苞用“义法”论《史记》	(164)
(二) 刘大魁论《史记》的特点	(166)
(三) 林纾论《史记》	(167)
(四) 桐城派其他诸家的评论	(168)
(五) 论叙事笔法	(170)
(六) 论写人艺术	(174)
第六章 清末至建国前的《史记》研究新收获	(179)
一、考证方面的新成果	(181)
(一) 司马迁的生卒	(181)
(二) 司马谈作史	(184)
(三) 《史记》的缺补	(186)
二、评论方面的新收获	(192)
(一) 对纪传体意义的新认识	(192)
(二) 《史记》的成书原因	(197)
(三) 梁启超论《史记》读法	(200)
第七章 建国以来《史记》研究的全面丰收	(203)
一、初见成效期	(204)
(一) 对司马迁行年的研究	(206)
(二) 关于《史记》的编纂方法及其历史地位	(209)

(三) 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探索·····	(213)
(四) 对《史记》名称及《史记》早期传播情况的研究·····	(212)
(五) 对《史记》人物传记成就的研究·····	(213)
(六) 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	(216)
二、逐步深入期·····	(219)
(一) 对司马迁思想的研究·····	(220)
(二) 关于游侠问题的探讨·····	(226)
三、全面丰收期·····	(232)
(一) 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	(232)
(二) 研究问题的不断深入·····	(246)
(三) 研究方法的改进与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	(268)
第八章 四十年来台湾《史记》研究概述·····	(281)
一、普及方面的工作·····	(282)
二、专题研究成果·····	(288)
第九章 国外《史记》研究概述·····	(297)
一、基本情况·····	(297)
二、资料整理·····	(302)
三、介绍几篇论文·····	(307)
第十章 开创《史记》研究的新局面·····	(315)
一、开拓新领域, 运用新方法·····	(315)
二、疑案定讞·····	(317)
三、关于资料整理·····	(319)
四、关于普及工作·····	(320)
五、成立《史记》研究中心, 培养《史记》研究人才·····	(321)
六、加强与海外《史记》研究者的联系, 促进《史记》研究走向世界·····	(322)
〔附录〕	
日本《史记》研究概述·····	(324)
后记·····	(335)

绪 论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关于他的生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根据《太史公自序》的《正义》，认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张鹏一、郑鹤声、朱东润、季镇淮等主此说；一是根据《太史公自序》的《索隐》，认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李长之、郭沫若等主此说。我们采取第一种说法，即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可能死于武帝末年和昭帝初年。司马迁的生卒年月大体和汉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前期太史令，为当时著名学者，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黄子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大学问家。司马谈写过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全面肯定黄老学说，而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他的论述比较有气度，在指出各家缺点的同时，也肯定了他们的优点，带有一种综合的气魄。司马谈的思想及其继承史官家世编写史书的志愿，给司马迁以深刻的影响，他所收集的史料和部分撰述，也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给予很大的帮助。

司马迁10岁学习“古文”，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曾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这对司马迁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他20岁那年，曾进行了一次漫游全国的学术旅行。他在《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

次漫游，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近代史的资料。此后，他又曾随从汉武帝巡游过许多地方，又奉使到过巴蜀以南邛、笮、昆明。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给他写作《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谈死后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到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公元前98年，因李陵事件触犯了武帝，被处以腐刑。当时，《史记》“草创未半”，司马迁忍受着奇耻大辱，从古代那些“倜傥非常之人”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他说：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之下，他发愤著书，终于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千古不朽的著作——《史记》。

《史记》的产生，也是汉武帝时代大一统社会的要求。当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兴盛，是封建时代的上升时期，这给司马迁写作《史记》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张大可认为，这种客观条件包括五个方面：其一，如何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学术的总结；其二，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其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宏阔昂扬的时代，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其四，汉武帝后期阶级矛盾尖锐，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其五，文景之

世开明政治的流风余韵，启迪了司马迁的自成“一家之言”。

（《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因此，《史记》的出现，可以用两句话作概括：时代的要求，天才的创造。

《史记》最初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东汉桓帝时始有《史记》之名，以后就相沿下来了。这部巨著，上起轩辕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130篇，52万多字。《史记》的出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也给传记文学开辟了一条新道路。鲁迅先生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概括了它的史学、文学成就。卓越的见识，独创的体裁，求实的精神，强烈的爱憎，优美的文笔，使《史记》犹如一块丰碑矗立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之林，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史记》问世以来，研究者代不乏人。仅清代研究《史记》留下文章著述的学者就有30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史记》研究更加活跃，硕果累累。从总的方面看，两千多年来《史记》研究的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汉魏六朝时期，是《史记》的传播和初步研究时期。由于统治者把《史记》视为“谤书”，因此，它的传播遇到很大的阻力，直到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才得到广泛的流传。司马迁的外孙杨惲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后来，《史记》在流传中有所残缺，褚少孙等人又补续了某些篇章，使《史记》成为完璧。桓宽《盐铁论》、刘向《别录》已开始节引或直接引用《史记》原文，高诱用《史记》注释《吕氏春秋》、《战国策》，他们对《史记》的传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时期谯周、颜之推对《史记》事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研究方面看，本时期属于起步阶段，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发表过许多

意见，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的实录精神。从对后代的影响来说，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扬雄、应劭、刘勰等人指出司马迁有“爱奇”倾向，甚至把“奇”与“义”、“奇”与“经”对等看待，后来许多学者继承了这种观点，只可惜他们没有深究“奇”的真正涵义。其二是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评价：“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他们的评价对后代影响很大，以至于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史记》研究的一条主线，但也引起了历代学者的争议。其三是班马优劣之论。“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史通·鉴识》）这在后代也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议，甚至成为一门学问。总之，本时期是《史记》研究的开创期，给后代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时期形成的《史记》三家注，是《史记》研究史上第一块里程碑。从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到注人、注事、注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等，无所不备，对后人阅读理解《史记》帮助很大。其中虽有错误，但仍不失为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本时期，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刘知几、皇甫湜等对《史记》的纪传体予以高度评价。就《史记》五体而言，唐人的评论虽有一些偏激之辞，但总体上还是持肯定态度。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唐代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才得到空前未有的认识和开发。韩愈以“雄深雅健”赞誉《史记》的语言风格，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史记》的总体面貌，都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宋代始开评论《史记》之风气，或论史事，或评人物，或谈文章，有褒有贬，不宗一家。大部分学者对《史记》持肯定态度，

《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宋代刊刻《史记》的本子多达30余种，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欧阳修、曾巩、三苏以及秦观、黄庭坚、洪迈、刘辰翁、吕祖谦、黄履翁、黄震等人都是《史记》文章的积极推崇者。宋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课题：其一，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开拓了《史记》研究新领域。其二，苏辙、马存认为，司马迁壮游天下的阅历对他性情的陶冶、文章风格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知人论世的剴切之言。本时期的评论，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班马异同》这样的专门著作，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本时期王若虚撰《史记辨惑》十一卷，对《史记》在采摭、立论、体例、文字等方面的失误，广为疑惑，并略作辨证。但多偏激之辞。

元代除了在评论方面继承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进行广泛的宣传。元代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时期，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如《灞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田单复齐》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反过来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四、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随着复古运动的兴起，一些学者致力于《史记》的摘抄和评论，成为风气。像茅坤、唐顺之、归有光等人都评点过《史记》，他们对《史记》文章的审美价值，刻划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由于明代小说的繁荣，许多学者把《史记》与小说进行比较，探索其中的内在联系，金圣叹是最著名的一位。这是一个新的角度，新的成果。杨慎、柯维骐、郝敬等人的考辨工作也在某些方面发前人未所发，启人耳目。另外，以凌稚隆《史记评林》为代表的辑评工作，搜集整理各家评论，汇为一编，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们称为“渡海之筏”，这也是明人对《史记》研究

的一大贡献。

五、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其涉猎《史记》者之多，评论方面之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清人的主要贡献在考据，何焯、汪越、杭世骏、牛运震、邵泰衡、王鸣盛、赵翼、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尚镛、张文虎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与当时的文化高压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本时期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的以桐城派最有代表性，方苞、刘大槐、姚鼐、曾国藩直到林纾，都十分推崇《史记》的文章，并有专文论述。除此之外，姚莹、吴见思、汤谐、邵晋涵、李晚芳、章学诚、刘熙载等人，也对《史记》的文学性作了探讨，发表了不少引人注意的评论。总之，清代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在考证、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比前代更加显著的成绩。

六、清末至建国前，是承前启后的时期。《史记》研究在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司马迁和《史记》的名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人心。《史记》全面走向社会，走向群众，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收获。而且，许多学者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梁启超对《史记》读法的论述，王国维对司马迁生卒年的考证，顾颉刚、李长之对司马谈作史的探究，余嘉锡对太史公书亡篇的考释，李景星对《史记》文章的评议，郑鹤声对史汉优劣问题研究的总结，李长之对司马迁人格与风格的评述，鲁实先对《史记会注考证》的驳议，朱东润对《史记》断限、伪窜、史实抵牾诸问题的考索，靳德峻对《史记》体例的分析，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成就。其他如章炳麟、李大钊、鲁迅、茅盾、刘师培、范文澜、吕思勉、罗根泽、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也在各自的著作中程度不同地论述了《史记》。本时期的成就为建国后《史记》研究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七、建国后，这是《史记》研究的全面丰收期，成果最为

辉煌。本时期的《史记》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广大文史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史记》研究有了科学的、正确的方向。50年代为初见成效期，在普及宣传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向深入方向发展。60年代前半期为逐步深入期，对司马迁思想有了较深的探索。1977年以后，为全面丰收期，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逐步深入，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出版的专著有100多部（包括标点整理的古籍），学术论文1600多篇（包括欣赏文章）。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学术界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电脑等现代化的工具也被运用到《史记》研究上来了，这是前代无法比拟的。当然，本时期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用今人思想改铸司马迁，或为尊者讳，或过分苛求，出现了拔高或贬低司马迁的倾向，这是值得注意克服的倾向。

台湾的《史记》研究，是我国《史记》研究的一部分。40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迄今为止，大约发表了近400篇论文，出版了40多部专著。马持盈、劳干、屈万里、杨家骆、徐文珊、陈飞龙等在《史记》的普及方面作出了贡献。王叔岷、施之勉、钱穆等对《史记》文字、史实、地名的校勘考订，赖明德对司马迁学术思想的研究，柯庆明对司马迁《项羽本纪》及整个《史记》悲剧意识的探索，徐复观对《史记》所蕴蓄的史学精神的发掘以及史汉比较研究，等等，都比较深入，启人耳目，值得重视。

司马迁不仅是中国文化名人，而且是世界文化名人，《史记》在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曾将《史记》许多篇译成俄文。法国汉学家沙畹曾将《史记》一部分译成法文。此外，英、德、美汉学家都翻译过《史记》许多篇，南朝鲜也出版了《史记》的抄译本。《史记》在日本的影响最大，已经形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

专门研究队伍。据初步统计，仅近现代而言，日本颇有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就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英雄等126人，仅研究专著和译著就有680多种，至于单篇的论文就不胜枚举了。日本学者在某些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我们国内的研究。当然，国外的《史记》研究还很不平衡，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而且，国外研究成果被介绍进来的也不多。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加强《史记》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也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以上我们简要叙述了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基本面貌。就国内研究情况来说，以1949年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大期。前期的研究，问题集中在六个方面：一、关于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学术渊源的研究；二、关于《史记》的取材、编纂体例、流传、影响的研究；三、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成就的研究；四、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五、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章、地理沿革的考证研究；六、《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他们在文字注释、史实考订、艺术成就评论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给后代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方法的陈旧，《史记》研究还停留在“史料学”的水平上。1949年以后，《史记》研究才有了质的变化，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不断开拓，不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门新的学科——“史记学”已经初具规模。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84页）不仅哲学，其他学科的发展亦是如此。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对两千年来的《史记》研究史进行宏观概括，对复杂的材料进行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掌握它的发展线索，批判地继

承一切有益的养料，是我们建立新《史记》学的必要条件。很遗憾，建国以后的《史记》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对《史记》研究史的系统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正是鉴于这样的现状，我们编写了这本《史记研究史略》。这是初步的尝试，期望对史记学的建立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最后，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每个时代的《史记》研究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与当时的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每章的开头尽可能地 从社会背景方面去论述《史记》研究的情况及其主要特点。

第二、两千多年来，《史记》研究代不乏人，不可能一一去介绍。因此，我们以问题的论述作为每章里面的小标题，进行综合评述。有些重要的学者将适当地予以介绍。

第三、每个时代的研究有不平衡现象，清代和解放后成果最为突出，因此，全书在这两章相应地多花了些笔墨。港台及国外《史记》研究的成果由于资料有限，只是简要地介绍了一些情况，以期彼此沟通、交流，使《史记》研究逐步走向世界。

第四、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将有关问题适当地进行了集中论述，时代前后略有移动。如“班马异同”问题，汉魏六朝时就已出现，宋代成为专门学问，后代乃至今天，仍有学者研究，因此，这个问题就列入宋代部分，把前代及后代的相关材料放在一起进行论述。

第五、为了体例统一，引用前贤后哲的材料时，尊名前一律省去“先生”、“同志”字样。引文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出处，以后不再注明。所收资料截止1989年4月。

两千年来的《史记》研究成果累累，我们在论述中，尽可能做到抓住主要的方面进行评述，同时也注意兼顾到其他一般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两位青年后学水平有限，要对两千多年的《史记》研究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评论，确实感到十分不易，书中的遗漏和错误之处肯定不少，欢迎专家学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